

加强党性修养， 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山里人

每每看到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例警示，痛心之余，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党纪党规越来越健全，各类组织生活和学习不可谓不多，组织的告诫和要求也很明确，为什么在外部环境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持党性原则、经得起各种考验，而有的党员干部却在诱惑和考验面前打了败仗、跌了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重视党性修养，愿不愿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进一步说明，在党性修养上，外因是改变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有强烈的主观愿望和要求，才有加强修养的内在动力，靠别人、靠外力的被动式修养，是难以奏效的。基于这些思考，我感到，要使党性修养成为每个党员的良好素养和自觉行动，不断提高修养的境界和整体水平，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要自觉修养，自我改造。陈毅元帅在《手莫伸》一诗中形象地揭示了加强自我修养的道理，诗中道：“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并不否认权力、地位、美色和赞颂的诱惑力，如何抵御这种诱惑，他自己的心得是，“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育，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这“三想”，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坚强党性的具体体现，是党的高级干部自我约束、自觉修养的生动写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的各种诱惑更加严峻、更加复杂、更加无所不在，如何通过加强自我修养来提高抵御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课

题。在这方面，我感到，很重要的要坚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重，就是要始终牢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始终牢记党的历史责任，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名誉，注重自己的形象。自省，就是要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严于自我解剖，反思自己的思想，检点自己的行为。陶行知先生有一个“每天四问”的座右铭，即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就是古人讲的“吾日三省吾身”。自警，就是要自己给自己敲警钟，警示自己不要违背党的政治原则、党纪国法和思想道德准则。以自己过去的失误为鉴，警示自己不重犯过去的错误；以别人的教训为鉴，警示自己时刻筑牢廉洁自律的防线。自励，就是要自我激励、自我鞭策，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四自”做好了，自觉修养、自我改造就在其中。

其次，要坚持经常，终身修养。党性修养搞一阵子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持党性修养。为什么党性修养坚持难？我认为，难就难在党性修养有时候要作出自我牺牲，甚至作出痛苦选择；难就难在党性修养不是一成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会遇到许多复杂情况和各种考验。有人把坚持党性修养概括为“四易四难”，就是有人监督的时候容易，缺少监督时难；职务低权力小的时候容易，位高权重时难；顺境的时候容易，受挫折时难；创业奋斗的时候容易，功成名就时难。这个概括不一定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性修养的艰巨性。我们每一个党员同

志，工作时间有长有短，职务层级有高低，个人经历和岗位也不尽相同，但在党性修养问题上，大家应当抱定一个信念，就是要持之以恒地、经常不断地，按照党的先进性要求进行自我改造、自我约束，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地位，都要矢志不移、不改初衷，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一个人的一生都在积累自己的品质，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应该不断积累自己的党性，使自己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无愧于先锋队战士的光荣称号。

再者，要言行一致，躬行实践。党性修养好不好，要看做到做不到。这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党性修养难在实践、贵在实践。坚强的党性不是说出来、喊出来的，最终要通过付诸实践来完成，通过行动来检验。战争年代，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群众看的很清楚，因为党员往往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年代，虽然所处环境、党员成分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群众同样心中有杆秤。有的党员甚至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人，群众评论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味道”；而许多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什么环境下，都坚持做到大公无私、敬业奉献、为人表率，生怕自己落在群众后面。群众对党员的评价，实质上反映的是党性修养的两种态度、两种境界，是真心修养还是搞“泡沫修养”“嘴皮修养”。因此，讲加强党性修养，一定要注重修于内而形于外、修于心而笃于行，始终坚持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自觉做到表态心态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会上会下一个样、对人对己一个样。

最后，要严于律己，接受监督。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批转全党且广为流传的两句话：“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用形象的比喻批评了当时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今天看来，这两句话仍有的现实针对性。分析当前党内批评监督开展不起来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些党员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横攀竖比，自我感觉良好，因而不愿意接受来自组织和群众的批评监督，这与党性修养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严于解剖自己，勇于自我批评，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随时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是党性修养的一条重要原则，应当很好地体现到这次党性分析评议中去，体现到经常性修养锻炼中去。加强党性修养和自我锻炼，一条重要的标志是看能不能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干部，要抱着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做到：自我批评敢于亮丑，敢于触及思想深层次问题；批评同志以诚相见，与人为善，大胆直言；接受批评虚心大度，闻过则喜、闻过则改，防止和克服患得患失心理和相互攀比思想。通过严肃认真的与自我批评，切实起到解决问题、鼓舞干劲、锤炼党性、增强团结的作用。

总之，加强党性修养和自我锻炼，必须强化自觉修养、自我改造的意识，必须要有坚持经常、终身的毅力，必须树立言行一致、躬行实践的作风，必须提高严于律己、接受勇气。

不失时机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韩鑫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过去5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成绩单，一项项数据十分亮眼。2016年至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15%，相当于节能4.8亿吨标准煤，节约能源成本约4000亿元，同期，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18%……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制造业不仅为生态环境改善和能源资源节约作出积极贡献，更蹚出了一条破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绿色经济已是大势所趋。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从供给侧看，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症结在工业、难点在工业、突破点也在工业。当前，以钢铁、水泥等为主的传统高耗能行业在工业中的占比仍然较高，但其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正逐渐减弱，只有将先进的绿色工艺技术、管理理念注入传统产业，建立低耗高产的制造体系，才能使之焕发新的活力。从需求侧看，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绿色安全等高品质产品的消费需求，同样离不开工业体系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大力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才能补上供给能力不足的短板。

近年来，为引导工业绿色发展，我国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助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驶入快车道，绿色产品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提前出清1.4亿吨“地条钢”产能，为产业转型升级腾出新空间；累计推广绿色产品近2万种，拉动了绿色消费增长。但总体上看，我国工业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产业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今，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绿色制造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制造业竞争力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加快制造业绿

色转型时不我待，必须着力挖掘绿色增长潜能，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推动工业绿色发展，要转变观念，辩证看待发展与绿色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设置一条约束能耗、控污减排的红线，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效益，尤其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工业企业开工率不足，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加快转变增长模式，才能为企业开辟新的增长点。例如，投资节能减排设备，长远来看能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上马循环经济项目、变废为宝，可以创造新的市场机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工业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中站得稳、行得远。

推动工业绿色发展，要产业联动，借助产业链和工业园区形成合力。应当看到，我国工业绿色转型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巩固绿色发展成效，挖掘绿色增长空间，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协同互助、共同推进。纵向看，龙头企业率先实现绿色转型，有利于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快绿色发展步伐，推动整个产业链绿色协同发展。横向看，工业园区应充分发挥责任主体作用，管理与服务并重，让绿色制造以园区为轴心向四周辐射。

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回顾过去5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有力支撑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面向未来，仍需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加快绿色发展步伐，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创新支撑与资源保障。

来源：《人民日报》

给大数据杀熟戴上“紧箍咒”

张敬伟

利用大数据“杀熟”，已经成为在线旅游平台惯常的做法，也备受公众诟病。8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要求，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基于旅游者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同时要求，在线旅游网站不得擅自屏蔽删除评价。

浏览手机、使用APP，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习惯。当移动互联网升级到人工智能时代，形形色色的大数据平台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为市场逐利的工具。有些在线旅游平台经营者，更是利用大数据手段，收集旅游者的消费记录，分析其旅游偏好，给消费者推送筛选过并对旅游从业者有利可图的信息。在此情势下，消费者不仅失去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利，在线旅游经营者也通过不正当竞争破坏了业态公平。值得一提的是，被误导的旅游者一旦发现大数据推送的旅游产品名不副实而发表客观评价时，则会被在线旅游平台删除和屏蔽。

大数据是个好东西，但是被滥用或变成资本逐利工具，就会异化变质。所以，人们发现手机越来越智能化了，不仅提供了诸多便利，而且还会揣摩每个人的“心理”——只要打开手机，你最喜欢的新闻、商品、娱乐就会推送到你最容易看到的页面上。这让人细思极恐，手机也会“读心术”了吗？其实不然，这是各路网站、APP、商业平台根据每个人的浏览喜好和消费习惯，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的“专门服务”。

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商业网站平

台一旦以商业功利为前提，将自己和自己有着利益关系的商品推送，人们就会被误导消费。即如在线旅游经营者，其用大数据分析，推送的都是符合自己市场利益的旅游产品，而且删除消费者的评价。如前所述，这就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了，不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被破坏，消费者也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虚拟世界不是法外空间，和实体市场一样也要纳入市场监管，更要维持最基本的市场公平。通过大数据手段实现市场垄断，是要接受调查乃至被课以天价罚款的。

中国数字经济已经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各类商业APP利用人工智能杀熟的手段更“高明”。在此情势下，必须要给包括在线旅游经营者戴上紧箍咒，促其善用大数据手段，给数字经济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创造更公平高效的数字营商环境，而不是利用大数据手段“杀熟”。

就此而言，《规定》来得及时，也颇有亮点。

首先，《规定》赶在10月1日正式施行，具有为十一、中秋“黄金周”背书的现实意义。这是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最重要的长假，且消费市场已经逐渐恢复，不出意外，将会迎来旅游消费大爆发。《规定》具有精准规范旅游市场的作用。

其次，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更具威慑性。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如果平台出现价格歧视的行为，执法部门将依照《电子商务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最高罚50万元）。《规定》中删去具体明确罚款的规定。这意味着，执法部门在处罚上的“自由裁量”更具威慑性。

来源：《北京青年报》



慈湖书院

沈国峰 摄

让自觉接受监督成为一种习惯

安吉宁

权力运行的规律性和执政党执政地位，决定了加强监督的重要性。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而言，进一步提高对监督的适应能力已不可回避。自觉接受监督，表现的是一种执政行为，昭示的是一种执政理念，展示的是一种执政形象，必须坦诚面对、自觉接受。

监督，是对权力运行的提醒和督促，是权力运行的一道安全屏障。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如感觉不到强有力的社会监督的存在，手中的权力失去约束，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人类几千年政治发展史反复证明的一条铁律。人类总结政治实践得出一个规律，叫“欲望腐蚀权力”规律，揭示了个人欲望腐蚀公权的特征。孟德斯鸠说过，“有权力的人在运用

权力时非走到极限决不停止”。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认为，“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对权力实行制约、实行监督。干部成长需要自律，也要他律，需要来自各方面监督，单单依靠自己的觉悟抵制腐败往往并不可靠。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制约和监督权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重要支撑。让权力运行接受监督约束，也是党对权力属性的深刻认识和权力属性的准确把握。毛泽东在1945年同黄炎培谈话中就指出，“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就是要走民主之路、监

督之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严起来，加强制约和监督，才能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才能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和制度框架下行使权力，确保权力的运行始终致力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为人民谋取幸福。

监督和被监督是矛盾的统一体，监督是一剂苦口良药，提醒源自关爱。大量事实证明，最大的爱护莫过于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从防微杜渐的角度来说，监督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爱护、最好的保护、最真诚的帮助，有了健全而正常的监督，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就会谨慎，自律意识就会

增强，就会常常有临深履薄之感和忧患意识。发现党员干部有缺点和不足，通过及时帮助、批评，就可以防止党员干部由小过铸成大错，促使干部改过自新，避免误入歧途。

习惯监督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习以为常，它体现的是一种政治素质和境界。不习惯接受监督，不依法接受监督，不自觉接受监督，往往都是一些“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人，一些不讲原则的人，一些贪枉枉法的人。领导干部越是欢迎别人监督，就越能在工作中行得端、站得稳、走得正，它反映了一种修养、觉悟和胸襟，它表明的是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品质，善纳批评的气度和政治上的坚定和清醒。

别忘了利益攸关方

吴兰友

工信部虽然拟规定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用户同意不得进行短信或电话营销”，事实上绝大多数单位和个人也不可能经用户同意再发送短信或电话营销。这正如过去一度极为泛滥的诈骗电话，不可能存在“诈骗者”先经用户同意再打诈骗电话之事。

所以，治理骚扰电话和短信制定罚则很重要。如果发生违法违规行为，但没有相应处罚依据，处罚就很难落到实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落实利益攸关方——电信部门的

防范和治理责任。从前两年治理电信诈骗的情况看，猖獗多年的电信诈骗很快得到有效治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落实公安、电信、银行等多方的责任，并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

治理骚扰电话短信也是如此——必须强化电信部门的责任。若不落实电信部门的责任，他们就没有动力和压力从制度、技术等方面封堵骚扰电话和短信，治理效果恐怕就要大打折扣。

来源：《北京青年报》